

绪 论

研究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是一个严肃而比较敏感的课题。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战后日本文化和处理中日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半个多世纪来，战争的伤痛始终影响着中国和亚洲其他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特别是日本战后政治与文化表现出的对那场侵略战争的错误认知理念和认知行为，屡屡严重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心。

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是在日本战败后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那场战争的认知是战后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战后日本文化战争认知理念的形成既是日本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淀，又是日本文化的新发展，它真实而深刻地显示了大和民族的现代精神实质和灵魂特征。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政府以首相为代表的高级官员几乎每年都要参拜供奉着法西斯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日本文部省也不断地篡改历史教科书，掩盖、否认、歪曲日本法西斯的侵

略罪行，日本的右翼势力越来越嚣张，公开为受到历史公正审判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鸣怨叫屈，大肆宣扬否认、歪曲、美化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观点和谬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必要对战后日本文化进行深入探究，认真研究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寻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研究本课题，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战后日本文化，更能够帮助人们时刻警惕法西斯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的图谋，更好地处理中日两国的关系，以维护世界的和平。

本课题主要是研究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既然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理念是战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综合发展的汇集和意识积淀，因此，本课题在对战后日本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又探究了战后日本政治、教育、戏剧、宗教等对战争认知理念的深刻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并没有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真正的反思、批判（这是指那些所谓的进步文化、文学作品，右翼文化作品的反动性显而易见），战后日本政治、教育、文学、戏剧、宗教等领域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上存在着淡化、模糊、歪曲、否认、美化那场侵略战争的战争认知理念。

二

以文学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存在着两方面的思想因素：一方面，战后日本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战争给日本人民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失和严重的精神创伤，揭露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专制和残暴，表现出

了对给日本国家和国民造成深重灾难的战争的反对态度。这是战后日本文化在战争认知方面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应当看到，战后日本文化的战争认知理念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思想意识。在战后日本文学中，这种错误认知理念是以艺术手法通过文学形象体现出来的。这就具有了很大的隐蔽性和蒙骗性。在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领域，曾有许多学者及其著作认为，战后日本文学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战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是善良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美好愿望引申出来的一种思想理念。

战后日本文学所表现的并不是“反战”，而是“反对战败”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学反对的是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失败”。因为“战败”，日本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梦想破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奉献”全都付之东流了。战后文学的主要流派（如民主主义文学潮流、战后派、无赖派、第三新人派等）和主要战争文学作家（如野间宏、石川达三、大冈升平等）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反对战败”思想。这种“反对战败”思想与真正的“反战”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反战”作品是作家以自己的勇气、良知和高尚的艺术道德勇敢地以文学作品为武器，向一切不正义战争进行战斗，而战后日本文学的“反对战败”作品实际上是支持法西斯发动的那场战争，反对的只是战争的“失败”。换句话说，如果侵略战争不失败，那就不反对。

战后日本文学极力描绘日本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灾难，宣扬“日本受害论”。战后文学的许多作品把日本表现为战争的“受害者”。许多作品精心描绘了战争给日本国民造成的严重损失，战争使日本国民生活极为艰难，他们缺吃少穿，缺医少药，生活在极端困苦之中。这种悲惨景象在民主主义文学、战后派文学、无

赖派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些作品把战争期间日本国民和军队遭到盟军打击的景象描绘得如地狱一般，在石川达三的《风中芦苇》中，战争后期日本东京遭受盟军空袭后的情形被描绘得惨不忍睹，在大冈升平的笔下菲律宾战场上，撤退的日本士兵遭到了美军的猛烈攻击，日本士兵死伤惨重，景象极为悲惨。战后文学还着力表现战争给日本国民造成的严重的心灵创伤，战后派文学的转向体验、战争体验和战败体验小说对日本国民的心灵创伤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表现。法西斯的专制残暴统治，使日本知识分子丧失了作为，灵魂失去家园，他们备感伤心；战争的痛苦记忆，使复员军人无法适应战后的生活，无法寻找到自我；战败后的占领社会，使许多国民感到屈辱等等。战后文学还出现了大量的以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为题材的作品，这就是日本文学中的“原爆文学”。“原爆文学”更是把日本描绘成了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原子弹爆炸给广岛、长崎市民造成的身心伤害极为严重和悲惨。战后文学极力表现的这种“日本受害论”，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抹杀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侵略罪责。因为既然是“受害者”了，那自然也就没有战争责任了。这种观念对战后日本社会和国民的战争认知理念影响极为深远，这也是战后日本国民对右翼势力采取默认、纵容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战后文学存在着故意淡化、模糊、歪曲、否认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罪责的思想意识。许多战争题材的作品，故意对战场上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轻描淡写，战后派文学的这种意识尤为明显，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竟然把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诬陷为中国村民自己干的；大冈升平的小说《俘虏记》、《野火》等作品对日军在菲律宾的暴行更是故意进行淡化、歪曲式描写，故意为那些残暴的侵略者开脱罪责。

战后日本文学的许多作品还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思想、运动

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仇视态度。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风中芦苇》通过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思想和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反感；大冈升平的《野火》等小说则表现了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仇视心理；还有一些作品也流露出了对新中国的反感心态等等。

战后文学的这种战争认知理念是与战后日本政治、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分不开的。在战后日本政治中，由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和20世纪后期日美两国的合作、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冷战局面的形成、战后新宪法对天皇的保留、日本经济力量的迅速增强等原因，日本战后的战争认知理念出现了仇视和反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潮，而社会主义新中国又是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的重点侵略国家，这种复杂的政治因素极大地影响到了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的正确认识和反思。

战后日本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及新教育内容的实施对日本国民的战争认知理念也具有深刻影响。由于战前、战时的法西斯教育体制被彻底打破，实行教育民主化、民间化管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对这种教育管理体制越来越不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逐步加强了对教育体制、教育内容的控制与管理。战后日本教育始终处于民主管理与政府控制的冲突中。日本战后教育的这种矛盾冲突，使教育内容的变化往往出现矛盾，这也使日本极右势力的战争观、历史观不断向教育领域渗透，导致了历史教科书问题经常出现。

战后戏剧作为战后日本文学艺术的一个代表在战争认知理念上也没有超出狭隘的日本民族主义观。战后戏剧同样存在着“反对战败”，宣扬“日本受害论”，有意模糊、歪曲、否认侵略战争罪责的思想观念。这种战争认知理念在戏剧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三岛由纪夫的创作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战后日本以神道教为代表的宗教发展也对战争认知理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神道教作为日本民族宗教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在战争时期曾发展为登峰造极的国家神道,成为了法西斯军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的帮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战争罪责。战后,在民主主义改革潮流中,神道教虽然被降格为一般民间宗教,但它仍然把日本天皇作为教祖,把日本历史上因战争死亡近250万的军人灵魂作为供奉的对象,这就使神道教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日本精神的象征,以首相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官员经常参拜供奉着法西斯战犯灵牌的靖国神社,表明了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认知理念明显具有错误,也说明法西斯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日本仍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三

日本战后文化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的战争认知理念,是日本文化传统特点与战后社会发展相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也是日本民族性格与思维意识在现代文化中的一种新积淀。

日本文化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它深深地扎根于日本国家与民族深厚的历史土壤中。日本约在距今10000—8000年前进入母系氏族社会,出现了巫术文化,约公元3—7世纪,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入日本,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史也真正开始了。此时,大和氏族统一了日本,建立起了天皇制国家。公元7—19世纪中期,是日本封建社会时期。在公元7—12世纪的封建社会早期阶段,日本借用汉字创造了“万叶假名”,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文学艺术从此得到了繁荣发展;13—16世纪的封建社会中期,日本出现了武士文化;17—19世纪的封建社会后期,日本封建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在强大的西

方文化影响下，日本于 1868 年开始了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近代史的开始。1868—1912 年的明治时代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日本掀起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高潮。到 20 世纪初期的大正时代，日本成长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此时，日本的近代文化形态得以确立。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的昭和时代，是日本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形成时期。法西斯军国主义文化的发展导致了日本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结果发动了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那场罪恶战争。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打击下，日本于 1945 年 8 月宣布投降。

战后，日本并没有认真洗刷身上的污垢与罪孽，在美国的怂恿和指令下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匆忙上路了。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指令下，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主义改革，制定了新和平宪法，在保留天皇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经过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和 50 年代前期的努力，日本经济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从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经济进入起飞时期，经过 60 年代的高速增长，70 年代初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到 80 年代的昭和时代结束，日本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社会安定，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也进入繁荣时期。日本又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

其实，日本自近代以来的社会与文化发展始终是在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较量中向前行进。这种文化成分中既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有对日本社会政治起过主导作用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及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和日本主义等各种反动思潮。各种反动的带有侵略性的学说思潮在近代以来的发展成熟过程是伴随着日本对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的侵略同步进行的。1894 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清朝的甲

午战争，进入20世纪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1931年，制造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随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1932年成立了所谓“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法西斯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37年，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期间，日本法西斯当局对国内的民主主义、共产主义思潮进行残酷镇压，使进步文化失去了生存条件。侵略文化长时期占据国家文化思想的主导地位，这必然使日本国民形成认同国家侵略行为的思想意识，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近现代文化主体精神之一是充满血腥的侵略文化。

战后，日本经济与社会各项事业的高速稳定发展，为日本当代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日本战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开展丰富活动；各种旧文化形态复活，日本政府为了指导文化发展，推出了“文化国家”的理念，把教养主义作为政府文化政策的根基，这既促进了高级文化的发展，也为各种旧文化形态的复活创造了条件；海外文化大量传入，伴随着美国军队对日本的占领，美国文化渗透到日本文化的各个层面；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不断融合。大众文化的社会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大众个体的自我更加明确，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文化的商品化，使文化的消费价值和特点更加突出，这必然使文化的负面效应充分显露，如战后靖国神社供奉战犯的灵牌和政要们不断前去参拜就是迎合了文化的这种负面性，同时，作为大众来说，他们只重点认同对自己有利的文化成分，这就使反思、反省、批判侵略战争等刻苦追求真理的人文文化探求者甚少。这也正是日本当代文化发展的一种困惑。

战后日本文化产生淡化、模糊、歪曲、否认、美化那场侵略战争的认知理念不是偶然的。日本战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日本传统文化的独特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战后日本文化仍具有“杂种性”的特质。日本著名文学史家、评论家加藤周一曾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文化的源头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日本的始原文化是在中国先进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日本的近代文化是在西化风潮中诞生的，战后文化则是在以美国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化影响下繁荣起来的。外来文化涌入时成分复杂，它在给日本文化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一些固守国粹的日本主义者企图整顿日本文化的这种杂种性，展开了一次次纯化日本文化的运动。已变为日本近代文化传统的神道教文化、皇国文化乃至法西斯军国主义文化都成为了战后一些所谓国粹主义者所极力弘扬的“国粹”文化。

战后日本文化具有“重层性”特点。日本文化的重层性结构体现在三种文化关系上，即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文化中的各领域、学科之间的关系。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日本文化会极据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外来文化，使其融合到自身的文化结构之中。战后，日本文化就是对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吸收改造，使当代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了美国文化的痕迹，在战争认识这样的敏感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保持了一致。我们看到日本在二战期间偷袭了珍珠港，美国也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但战后两国之间并没有因为战争认知问题产生摩擦和纠葛。日本在这个问题上，对美国和对亚洲国家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在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上，日本文化从来不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每个时代的新文化都是在保留

旧文化的基础上叠加起来的。这种重层结构的文化在当代的表现就是并不完全否定近代文化中天皇主义、神道文化乃至法西斯军国主义文化；在文化的各领域、学科之间的关系上，日本文化的纵向关系脉络清晰、联系密切，而横向联系比较松散、淡漠，形成了日本社会具有“纵式组织系统”的特点。这在当代文化上体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团体之间都按照单一的、明确的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原则构成“一”字形的纵向结构。

日本战后文化具有“双重性”的特征。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日本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岛国文化。日本四周环绕着大海，开国前凭借这样的天然屏障保护，免受外敌入侵，社会相对比较安定。这样的环境使日本民族性格具有双重性，即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和狭隘的排外心理，这既有助于形成巨大的团结力量，也容易导致心胸狭隘，由此而产生的皇国主义思想、日本主义文化促使日本屡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又属于海洋性季风气候，这使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中既有生活于季风气候中的被动、忍从态度，同时又因季节瞬息万变而容易发生感情变化。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十哲郎把这种性格归结为“台风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时面彬彬有礼、温文儒雅，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这样的民族形成的集团力量在外族入侵面前能够团结一致，奋勇抵抗，但当自己成为强国时，就会走上疯狂地侵略他人的道路。战后，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日本成为高度发达的国家，日本民族的狭隘排外心理有了较充分的社会空间，这样，极端右翼势力得以滋长、发展，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想意识得到流传，导致了战后日本文化中对侵略战争缺少罪恶感因素的进一步增加。

战后日本文化仍具有鲜明的“耻感文化”特征。美国著名人类文化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

类型》提出了日本文化是“耻感文化”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日本文化是把知耻作为道德之本，这种知耻不是内心自责，而是以别人对自己批评为耻。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不同，罪感文化强调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罪感文化中的犯罪之人，不论罪行是否暴露，内心都会有罪恶感，并且都可以通过坦白罪行而减轻内心的痛苦，也就是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但是，耻感文化不但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反而认为坦白忏悔是自寻烦恼。战后日本以文学为代表的各种文化形态表现出的淡化、模糊、歪曲、否认、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想意识正是这种耻感文化的鲜明体现。特别是日本右翼势力炮制的所谓“自虐历史观”谬论，即认为日本如果承认南京大屠杀，承认自己在那场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就是日本人自己虐待自己，自己摧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这种错误反动的战争认知理念是耻感文化劣根性的最高体现。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 21 世纪，日本要想在国际上获得威望和树立新形象，就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光彩历史，就必须深刻反省批判自己发动的那场罪恶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同时，我们中华民族要想赢得普遍的尊重，就必须团结一致，努力建设，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力量强大的国家。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不受歧视和受尊重的地位。